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赵宗福 主编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

——基于青海玉树地区史诗歌手的田野调查

央吉卓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赵宗福 主编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

——基于青海玉树地区史诗歌手的田野调查

央吉卓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基于青海玉树地区史诗歌手的田野调查 / 央吉卓玛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6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5929 - 3

I. ①格… II. ①央… III. ①藏族—英雄史诗—歌手—调查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②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504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

插 页 2

字 数 301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赵宗福

2011年秋天，在印第安纳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和在潍坊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上，我提出了推进“地方民俗学”的学术设想，意在实实在在地发展繁荣区域民俗文化事业。

中国民俗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样式繁多，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因为此，钟敬文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总结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①。即使是分布区域很广，人数近十亿的汉族，也由于极为广泛的分布与地方化，其民俗文化也具有极强的地方性。所以各地民俗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极其明显，不可一概而论，或者说一言以蔽之，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对具体对象进行研究。这就需要有地方民俗学的存在。我理解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就是我国诸多地方民俗学的整体概括。

由于各地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状况和学术兴趣点不同，逐渐就形成了富有地域性的学术个性和研究倾向，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地方民俗学。特别是已经成立了地方民俗学学会和有高校民俗学学科点的地区，往往在学会或学科点的主导下，基本上有自己的学术侧重点和表述风格，成果也相对集中在某些方面。如青海民俗学界的成果往往集中在6个世居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在青海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上，古老的昆仑神话、多民族民歌花儿与花儿会、土族狂欢节纳顿、藏族史诗格萨尔、热贡文化、各民族婚礼以及歌舞风情等等，是当地学者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这也说明事实上具有

①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地域特色的“地方民俗学”是客观上已经存在的。

但是，不论地方民俗学如何发展与繁荣，都不可能与全国民俗学界绝缘，孤立地闭关而自得其乐。而是作为中国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愿地聚集在中国民俗学的大旗之下，至少与国内同行频繁交流，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不同风格、多彩多姿的地方民俗学，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民俗学这座学科大厦，丰富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内涵，其地位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以上这种局面，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科繁荣。这里借用日本学者佐野贤治教授的一句话：“21 世纪的民俗学应当在乡土、国家、世界三者的关联中推进自己的学科研究。”^① 我暂且把他说的“乡土”理解为地方民俗学。就是说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地方层面的民俗学研究和民俗文化土壤，同时也离不开国家层面如中国民俗学会及其相关学科点的整体发展规划、组织协调和引领指导，以及世界前沿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方法创新。

事实上三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甚至融汇的，因为民俗文化资源是大家共享的，同时地方的民俗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和价值基本上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所以对某一地方的民俗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本地区的学者，往往有外地（特别是北京）甚至国外的学者来直接研究，其成果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地方性的。比如青海的花儿、格萨尔、黄南六月会、土族纳顿会等，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研究，而且与地方学者相互借鉴，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建构起了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事业。

民俗文化是我们的父老祖辈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最具有历史底蕴和生活气息的文化。她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我们的文化 DNA。自从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被自己所处的民俗文化所熏染、所教化、所塑造，最终把我们社会化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享用者、传承者和创造者。而我们作为民俗文化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个民俗生活者和文化传承者，还是一个民俗文化的田野者、探索者、诠释者，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和学术使命。

^① 佐野贤治、何彬：《地域社会与民俗学——“乡土研究”与综合性学习的接点》，《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4 期。

地方民俗学者研究的对象虽然大多是地方的民俗文化，但其意义不凡。一是科学地挖掘地方民俗文化内涵，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保护发展民族文化传统尽到一个地方学者的责任；二是通过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参与和支持地方文化建设，发挥民俗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文明进步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三是通过民俗研究与学科建设业绩，推助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这就是作为一个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

作为地方民俗学者要真正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唯其如此，方有可能以优异的业绩来实现学术愿望，否则就只能是理想上的巨人，成果上的矮子。

学术品质基于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对学术来说就是道德品格，学术与非学术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遵循学术规范。就跟一个人一样，对社会对他人没有诚信，没有感恩之情，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正确的耻辱感和是非观，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益于社会，他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人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基本保证，而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品质的基本保证。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必须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不断提升学术品质。

这些年来，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术浮躁之风盛行，一些人把天下利器当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游戏，从概念到概念，不切实际，洋洋数十万言，管用的没几句；有的人把学问当成了坑蒙拐骗的黑市场，复制加粘贴，抄袭加改编，洋洋万言不见一个文献出处，不见自己一点个人见解，人云亦云，甚或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应有的学术严肃性和文化软实力。这种现象自然也不免污染到了民俗学界，“民俗主义”乃至伪学术甚至部分地占据了神圣的学术殿堂。这是值得警惕防范的。我们主张在民俗文化研究中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扎实严谨的学风文风，坚决反对学术不端，严格遵守学术伦理。我相信学问无愧我心，公道自在人心。

在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中，不仅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还要大力鼓励学术创新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要靠创意，科学的发展繁荣要靠理论观点方法的创新。创新是人文科学的使命和责任，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必须要有理论观点上的新收获，没有创新的科研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的

全方位浪费,甚至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的地方民俗学者必须要始终不渝地追求学术创新,以创新的高质量的成果来为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增光添彩。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立足地方民俗文化的实际,放眼国内国际的学术语境,以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为内核,运用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推出一批代表地方学术水平乃至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优秀成果,让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走出地区,走向全国,在国内外学术平台有一席之地,从而体现出地方民俗学者应有的价值。

青海民俗学会推出这套《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就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学术规范和学术品质上下功夫,试图从较高学术层次来展示青海地方民俗学的业绩,同时也从地方民俗学层面来为中国民俗学学术事业添砖加瓦,共同推进“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建设。

青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地之一。而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族民俗文化就是这三个“之一”的鲜活表征。从古老的昆仑神话到丰富多彩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给世人留下了神圣、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大美青海印象,同时也彰显出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十分鲜明的文化特色。因此历来得到学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至少在唐宋以来的大量古籍文献中就有对青海民俗事象的诸多记载,而在20世纪前叶,出现了像杨希尧的《青海风土记》、逯萌竹的《青海花儿新论》、李得贤的《少年漫谈》等民俗志记录和评论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民俗文化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青海花儿、藏族拉伊、各民族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以及其他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出版卓有成效,至今惠及学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不仅整理出版了“民族民间文化十套集成”等大型资料丛书,而且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是近年来,青海民俗学者先后推出了《青海花儿大典》、《昆仑神话》、《土族民间信仰解读》以及《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等一批富有特色的成果;还连续举办了“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国际学术论坛”、“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国际学术论坛”、“昆仑神话的现实精神与探险之路国际学术论坛”、“格萨尔与世界史诗国际学术论坛”、“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端学术会议。

而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点、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的建设,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队伍的学历层次提升、学术成果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多年来对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研究与论证,得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的认可和采纳。2011年11月召开的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把青海文化定位为“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正式开启了建设青海文化名省的新征程。这既是对青海民俗学界研究成果的认同,同时也为青海民俗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于是,青海省民俗学会在2012年5月应运而正式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美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台湾“中国民俗学会”、“中华民俗文化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等国内外50多家学术单位以贺信贺函方式进行了支持。学会的成立,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从零散无依、各自为阵形成学术合力、走向集约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组织基础。

青海省民俗学会是目前青海省各学会中学学历层次和学术阵容最强大的学会,目前有会员100多人,其中拥有民俗学或相近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者近80人。理事会27人中,博士8人,硕士16人。在地方学会队伍中,这无疑是一支专业素养很高、学术研究潜力很大的难得的精良部队。如何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真正形成具有团队精神的地方民俗学学术力量,充分展现他们民俗文化研究的优势,发挥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中国的学术大厦实实在在地尽一份力量,这是我重点思考的问题。

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民俗文化,“非遗”保护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文化名省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新青海也离不开民俗文化。青海民俗文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民俗学会当然要顺应时代,乘势而上,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学术优势,在文化名省建设中积极进取,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看来,青海民俗学会作为本土的地方民俗学会,首先立足于青海的民俗文化实际,以青海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田野作业为基本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推出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调查研究力作,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立足于青海不等于学术视野局限于青海地域,而是要把青海

民俗文化放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俗学学术视野中。惟其如此,才能做出具有国内国际水准的学术成果来,也才能真正建设好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学,在学坛上才能赢得话语份额。事实证明,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就没有相应的学术竞争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学科或学术团体。所以,必须立足青海民俗文化实际,面向国内外民俗学领域,追踪本学科前沿,了解相关学科及整个学术界的发展动态,兼容并蓄,提升品质,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理论表述风格和学术研究实绩,不断增强学术软实力,不断赢得学术话语权,真正树立起青海地方民俗学者的形象,树立起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俗文化形象。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自学会成立之日起,我就把学会的奋斗目标定为立足青海,放眼国内国际学术语境,努力推进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也就是在采用民俗文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普遍性学术理论方法的同时,坚持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与民族化,致力于青海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民俗文化研究,以独到而不俗的学术业绩来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学。这样的定位也得到了同仁们一致的认同。

按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追求卓越品质”的原则,学会对学术发展做出了具体安排。一是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开展民俗文化田野工作,摸清青海民俗文化家底,重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二是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年会,选择某一主题进行民俗文化研讨,力求推出一批新成果;三是积极参与青海省各级各类学术活动,多方位地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四是积极策划主办或者协办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借以提升学术层次和学会影响力;五是积极与其他学会合作开展民俗文化调查和学术研究。同时提出集中力量办几件学术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在会员成果中精心遴选组织,争取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民俗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就是根据这一思路,从会员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课题、优秀的硕博论文和个别确有前期研究基础的自选项目中筛选,然后统一规划,统一目标,并根据出版社和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完善,再统一推荐出版。我们的目标是做成一套具有较高品质和学术含量的纯学术丛书,计划出版20本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是简单的把大家的成果集中出版。这些年来,我们以学会筹备组和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为核

心，每年积极组织省内民俗学者高标准地策划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选题确定到申报文本写定，从获批立项到开题论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比如在2012年青海民俗学者获批国家基金项目10余项，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我们的“民间”形式组织学者反复开会论证申报文本的，一遍遍地修改完善，个别文本甚至经过了三到五次论证才完成，最后以学者所属各单位的“官方”程序上报获批。这就是有同仁开玩笑的“辛苦归我们，荣誉归别人。”作为民间团体的工作，不仅仅是开会的费用，还有到处找会议场所、邀请专家学者、牺牲大家的休息时间、一次次地修改和打印文本，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到。当然天道酬勤酬善，多年来我们帮助策划论证后申报的民俗文化方面的项目也几乎是“无一漏网”地被获批立项。几年来的会员课题研究中，我们也是多次以不同形式参与讨论，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完成。而一些优秀硕博论文，也基本都是在学会学术骨干的指导或协助下完成的。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丛书，在一定意义上是青海民俗学会（前期为筹备组）多年来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做出的一点微薄贡献。

丛书的策划在青海民俗学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我在2011年5月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的邀请赴该社座谈中，就提出了出版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的设想，得到社长总编们的赞同，回青海后与同仁们开始商量具体的丛书规划。之后在曹宏举副社长的关心下，我与编辑刘艳女士多次沟通协商，同时各位同仁按规划进行撰写或修改。2012年5月，我拜访了赵剑英社长和曹宏举副总编，正式汇报丛书立意和学术标准以及进展情况，两位领导听后大加鼓励，于是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刘艳女士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宏举副总编多次过问，具体指导，关心支持学术事业和西部文化的情怀也让我感动。所以我当然无法脱俗地要真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刘艳女士，同时也感谢多年来与我兄弟姐妹般亲密合作的青海民俗学界同仁和本丛书的各位作者。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提出背景及意义	(1)
一 史诗歌手的研究对英雄史诗研究的独特价值	(2)
二 史诗歌手对于藏族文化传承系统的独特价值	(3)
第二节 学术史综述	(3)
一 国外史诗歌手研究	(3)
二 国内史诗歌手研究	(6)
第三节 研究理论、方法及资料来源	(15)
一 研究理论	(15)
二 研究方法	(16)
三 资料来源	(18)
第四节 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学术目标	(18)
第一章 藏族说唱艺术概况	(21)
第一节 藏族说唱艺术和艺人分类	(21)
一 仲与仲哇(故事及故事讲唱者)	(22)
二 古尔鲁(道歌)	(23)
三 堆巴与堆巴谐巴(颂赞词和颂赞者)	(24)
四 百(壮威歌)	(25)
五 岭仲与仲肯(《格萨尔王传》与史诗歌手)	(25)
六 喇嘛嘛尼与嘛尼巴	(27)
七 折嘎(道具说唱)	(28)

八 夏与扎年弹唱（对歌与六弦琴弹唱）	(29)
第二节 格萨尔史诗歌手分类	(31)
一 神授史诗歌手	(31)
二 掘藏史诗歌手	(33)
三 圆光史诗歌手	(35)
四 习得史诗歌手	(36)
五 依物史诗歌手	(37)
第三节 说唱艺术以及艺人之间的关系分析	(38)
第四节 史诗歌手的生境	(44)
一 自然空间	(45)
二 文化空间	(48)
三 社会空间	(53)
第二章 《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展演的基本形态	(58)
第一节 史诗歌手演述的基本类型	(58)
一 单口演述	(59)
二 对口演述	(59)
三 群口演述	(60)
四 类型划分的意义	(61)
第二节 史诗歌手演述的仪式过程	(64)
一 请神	(64)
二 降神	(65)
三 求告及送神	(66)
四 过渡仪式	(67)
五 认证仪式	(69)
六 仪式意义	(71)
第三节 史诗歌手演述中的信仰与禁忌	(71)
一 史诗歌手的信仰	(71)
二 史诗歌手的禁忌	(80)
三 史诗歌手中的性别构成	(94)

第三章 史诗歌手的传统文化内质与功能	(99)
第一节 千面英雄——格萨尔王的多面性	(100)
一 超凡性	(102)
二 反经济性	(102)
三 革命性	(102)
四 不稳定性	(103)
第二节 梦的解析——神奇传闻叙事分析	(109)
一 史诗歌手的说唱经历	(109)
二 史诗歌手的认同表达	(118)
第三节 远古余响——古老民族的信仰崇拜	(131)
一 蛙崇拜——史诗歌手的图腾记忆	(131)
二 史诗歌手的“巫”面孔	(146)
三 史诗歌手的神力崇拜	(160)
第四节 他者的扮演——史诗歌手的表演艺术	(168)
一 政府层面的影响	(170)
二 文化研究及咨询机构的影响	(175)
三 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组织的影响	(179)
四 以民众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的影响	(180)
第四章 史诗歌手面对的困境与未来	(184)
第一节 史诗歌手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184)
第二节 史诗歌手的保护与未来	(187)
一 中央政府的职能	(190)
二 咨询机构的职能	(191)
三 民间组织的职能	(191)
四 社区民众的自发保护	(194)
结论	(197)
附录	
附录一	(202)

附录二	(211)
附录三	(213)
附录四	(216)
附录五	(218)
附录六	(226)
附录七	(228)

参考文献	(249)
------------	-------

后记	(255)
----------	-------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提出背景及意义

作为我国民间文学艺苑中一朵历久弥香的文学奇葩，史诗《格萨尔王传》一直以来备受民间传统文化研究者的青睐，其研究成果也堪称丰硕。

在蔚为大观的史诗研究队伍中，有的研究者将侧重点放在史诗文本研究之上，并力求发现史诗在思想、修辞、情节等方面的超凡魅力；而有的研究者将着眼点放在史诗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努力发掘史诗中所蕴藏的历史文化讯息。

笔者发现，在拥有史诗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史诗研究的范畴和角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见物不见人”的怪圈。大家在惊叹古巴比伦史诗的悠远、荷马史诗的恢宏和印度史诗的深邃的同时，对那些传唱史诗的歌者却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些歌手的身世、经历都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鲜为人知。直到“荷马问题”的研究者发现史诗所面临的萎缩乃至消亡的状况，才意识到歌手的重要性。帕里和他的学生洛德得知在南斯拉夫尚有演述史诗的歌手存在，马上赶往那里进行调查，用自己的调研成果，为史诗歌手正名。虽然自此以后史诗歌手的研究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等都从不同角度对史诗歌手进行了解读，但仍未形成一定的研究规模。

随着世界史诗研究进入反思修正和学科范式转型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史诗研究专家，也将自己的研究触角深入到史诗研究的各个层面，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对史诗做出全新的尝试。然而经过几十年来的努力，我们虽然

在史诗研究理论、方法和切入视角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而言还是存在史诗研究视野缺乏开放性、理论观点存在片面性和研究方法缺乏系统性等问题。其中对史诗的表演者——史诗歌手的研究也处于研究理论与调查实际不能有效衔接的困境中。因此，对史诗歌手进行全新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史诗歌手的研究对英雄史诗研究的独特价值

以往对《格萨尔王传》史诗的研究一直以史诗的书面文本研究为主，对史诗的文学属性、语言特色、历史面向和审美特色等关照史诗文本自身的内容进行解析，历来被视为史诗研究的正统，而具有优先研究的特权。近年来史诗研究的视角有了较大的突破，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对史诗进行分析的研究开始异军突起，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遗憾的是，在史诗《格萨尔王传》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作为史诗的传承主体的史诗歌手，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被当成远古文化的“留声机”，仅作为研究者了解史诗的辅助工具。20世纪80年代以前，鲜有专门研究史诗歌手的论著问世。且在史诗歌手研究的初期，对史诗表演者的研究也被划归到史诗文本研究的名目之下，研究者认为史诗歌手的存在依托于史诗，没有史诗便没有史诗歌手。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民间文学的学科范式从研究文本向研究讲述主体，即研究故事讲述家和民间歌谣之歌手的转变，在史诗研究的学者队伍中也逐渐出现探讨史诗歌手的学者，但他们的研究重点还是以文本研究为主，对史诗歌手生命史的介绍也仅停留在人物背景介绍的层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史诗文本研究遭遇瓶颈，研究者为了克服这一难关将史诗歌手研究作为突破口之一，试图从史诗歌手表演性的角度，对史诗文本动态生成过程做出解释，这类研究也渐渐成为国内各民族史诗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为后人研究史诗歌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储备。

难以否认，在史诗歌手研究服务于史诗文本研究的学术宗旨下，关于史诗歌手生命史叙事中很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叙述被学者遗忘了。这些生命史叙事的特殊价值被湮没在史诗宏大叙事的背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研究地位。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史诗歌手的生命史叙事恰恰是揭开史诗历

史文化价值的关键点之一,对史诗歌手本身的关注和研究对拓宽史诗研究视野,促进史诗研究向多向度、多层次的方向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史诗歌手对于藏族文化传承系统的独特价值

被誉为藏族文化百科全书的史诗《格萨尔王传》,几乎包罗了藏民族文化的所有精髓。史诗自诞生以来,以其生动的故事情节、富有民族传统的叙事内容以及优美的唱词和唱腔吸引着无数史诗爱好者阅读史诗、感悟史诗和研究史诗。作为表演史诗的史诗歌手,被民众视为向世人介绍史诗文化和诠释藏族文化的“活字典”。史诗研究者认为,史诗歌手不仅是史诗传承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传播民族文化、守望民族文化的地方文化精英。

藏族文化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文献资料的记载、民族口头传统和传统节日及仪式行为。其中民族口头传统作为民间历史记忆的保存和传承方式,最为民众所熟知和喜爱。史诗歌手作为藏族口头传统的“集大成者”,不仅对史诗《格萨尔王传》有较好的掌握,对藏民族其他民间叙事传统和文化传统也非常熟悉。笔者认为对史诗歌手进行有效保护和研究,是传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完善藏族文化传承系统的关键点之一。

第二节 学术史综述

一 国外史诗歌手研究

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国外对《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史诗文本的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种现象是受国外传统史诗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影响;其次,原始文献资料缺乏、不能进行实地考察,特别是缺乏同民间艺人的密切联系等问题也造成了国外对《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研究不足的情况。这些因素使得许多国外史诗歌手研究成果或言之草草或流于表面,最终导致其对史诗歌手的研究明显落后于国内。

目前,就笔者目力所及,国外最早谈及《格萨尔王传》史诗歌手的是弗兰格,他在1914年加尔各答版《印度、西藏的古籍》一书第一卷中